

中 国 目 录 学 史

乔好勤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武昌)

序

中国目录学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泥土之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国目录学家和目录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创造了大量的书目文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目录学观点，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而著称于世，这些辉煌的成就，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应当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历史是不容割断的，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不懂得目录学的过去，也很难全面了解目录学的现状。现代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学习、研究和发展目录学，就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秀遗产，以古典目录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作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借鉴，有这种借鉴和没有这种借鉴是大不一样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出版了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罗孟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程千帆、徐友富合著的《校讎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1988年版）、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等目录学史研究的专著，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目录学史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在系统阐述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和古典书目著作的主要成就，叙述各个朝代目录学发展概貌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受“目录

学即目录之学”观点影响较深，很难摆脱从目录论述目录的模式，真正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将目录学史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学术联系起来，对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还显得不够。总之，与我国丰富的古典目录学遗产相比较还不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有幸读了乔好勤同志编写的专著《中国目录学史》，并嘱写一序，读后感到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录学史进行从古到今的综合研究，从殷商一直写到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构成了本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长期以来，在我国目录学史的研究领域里，人们认为中国目录学史就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十分薄弱，应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到了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目录学界的认识不断深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近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是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老一辈目录学家“壮心不已”地继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中年目录学研究者承前启后，发挥着骨干作用；青年目录学研究者思维敏锐，积极进取，是中国目录学未来发展希望之所在。正是由于组成了这样一支既有理论根底，又有活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目录学研究队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迭出，令人振奋。总结当代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成果，应当是中国目录学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目录学史是由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发展史和当代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所组成，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完整的。乔好勤同志有见及此，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密切联系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析目录学发展的社会原因。在论述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目录工作、目录和目录学思想时，将它们看成是整个社会文化

的组成部分，与同时代的各种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注意从学术文化思想的角度阐述目录学的演变过程，将当代目录学的发展写入了《中国目录学史》教科书中，填补了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提供了一幅从殷商一直到当代目录学发展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二、注意史论的有机结合。本书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对史实进行描述和必要的考证，按照目录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展开论述，使得各个时期目录学的成就比较集中、突出，较好地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阶段性、继承性和时代特征。在每章的后面，用一节的篇幅总结各个时期目录学思想的成就与进展。在写作方法上，注意将史实、评论、知识相互穿插，使史论有机结合起来。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讨论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凡有争议的问题，先列出各种观点，然后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目录学史》作为本科生的教材，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结构得体，条理清晰，评论公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我们热烈欢迎本书的出版，相信在世纪转变的历史年代会有一批“传世之作”问世，为中国目录学胜利地跨进 21 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彭斐章

1992 年 3 月于珞珈山

目 次

序	彭斐章
第一章 典籍的产生与目录的起源.....	(1)
第一节 从文字到图书.....	(2)
第二节 殷周文献的管理与目录工作的萌芽	(12)
第三节 孔子的古籍整理与目录工作	(17)
第二章 汉代目录学	(31)
第一节 汉代文化与目录工作	(31)
第二节 从一书目录到群书目录	(40)
第三节 刘向刘歆与《别录》《七略》	(43)
第四节 史志目录的产生和东汉目录学思想的发展 ...	(70)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82)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与目录工作的变革 ...	(82)
第二节 宫廷藏书目录与四部法的产生	(89)
第三节 私家目录与七分法体系的演变	(98)
第四节 个人著述目录的产生和专科目录的发展.....	(109)
第五节 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122)
第四章 隋唐五代目录学.....	(128)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化与目录工作.....	(128)

第二节	隋唐官府藏书的整理与目录工作	(132)
第三节	史志目录的发展与变革	(142)
第四节	私藏目录和专科目录	(154)
第五节	推荐目录的产生	(164)
第六节	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	(168)
第五章 宋代目录学		(178)
第一节	宋代文化与目录工作	(178)
第二节	宋代官府藏书与编目工作	(181)
第三节	史志目录	(189)
第四节	私家藏书目录	(203)
第五节	专科目录	(216)
第六节	索引的产生	(225)
第七节	宋代目录学理论的系统化和郑樵的目录学思想	(229)
第六章 元明时期目录学		(237)
第一节	元明官府藏书及其目录	(239)
第二节	史志目录	(242)
第三节	私家藏书目录	(254)
第四节	专科书目	(263)
第五节	书业书目、推荐书目与索引	(272)
第六节	明代的目录学研究与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	(279)
第七章 清代前期目录学		(284)
第一节	清代的考据学与目录学	(284)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	(286)
第三节	《明史·艺文志》与正史艺文志补证	(300)

第四节 私藏目录与版本目录.....	(302)
第五节 专科专题书目与索引.....	(310)
第六节 清代目录学家的派别与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316)
第八章 近现代目录学.....	(330)
第一节 古籍举要书目	(330)
第二节 新学西学书目	(337)
第三节 无产阶级早期的书目活动.....	(343)
第四节 私藏目录与版本目录.....	(346)
第五节 专科专题目录.....	(353)
第六节 馆藏目录、书业书目及其它.....	(360)
第七节 索引运动.....	(371)
第八节 目录学理论研究.....	(378)
第九章 新中国目录学.....	(392)
第一节 曲折发展四十年.....	(393)
第二节 书目工作组织管理.....	(401)
第三节 书目编纂.....	(406)
第四节 索引与文摘.....	(416)
第五节 目录学理论研究.....	(421)
参考书目	(439)
后记	(442)

第一章 典籍的产生与目录的起源

万事万物均有其源流，目录学也是一样。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溯其源，观其流，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改进和发展今天目录工作的借鉴。

关于中国目录的起源问题，是目录学史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早在唐朝初年，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就讨论过我国目录起于何时的问题。以后历代目录学家，凡有著述，无不涉此。但是，目录的起源像其它一些事物一样，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研究有深浅，追溯有远近，分歧在所难免。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种看法。

其一，自西汉末刘向刘歆编撰《别录》《七略》始。章学诚说“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①刘纪泽说“目录之学，启自西京。”^②范文澜也认为刘氏《七略》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③

其二，从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古籍，作《周易》“序卦传”或《诗》《书》小序算起。清代学者卢文弨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④余嘉锡亦谓“目录之作，莫古于斯。”余氏又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

① 章学诚《校讎通义·叙》 古籍出版社1956年

② 刘纪泽《目录学概论》 中华书局1931年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④ 卢文弨《鍾山札记》卷四

起萌芽。”^①

其三，认为殷商时期甲骨文献的管理即是目录工作的萌芽。姚名达谓：“夏商亦有典籍与目录否乎？曰：有，有。”并说：“考目录之渊源，至于斯而极矣。”^②王重民也认为殷代文献的管理已“包含着目录工作的雏形，代表着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起源，则是可以肯定的。”^③

有关目录起源诸说的提出，固各有依据，但或者将目录工作发展到相当成熟时期作为起源，无乃昧其先祖；或者因史料缺乏，真伪莫辨，立论暂且存疑。近现代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安阳殷墟的多次发掘，为考证目录工作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

总之，有目录必先有文献，有文献必先有文字。也就是说，有了文字才会有文献，有了一定数量的文献就会产生关于目录的社会需求。所以，我们追溯目录的起源，必须先从文字和文献说起。当然，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以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个进程为基础的。

第一节 从文字到图书

文字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用以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工具。文字的出现和文字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文明的创造是居住在不同地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根本活动。中华文明是由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中国人在劳动中开创的、世界上唯一的从旧石器时代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文化系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中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中华书局1963年

②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 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③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中华书局1984年

国文明在其开创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有过广泛的交流，既影响了其他民族，也受到其它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任何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只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利用我国夏代文献记载稀少，夏代考古薄弱的机会，编造出各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外来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中国文字制度的形成

1. 关于中国文字产生的传说

我国从原始社会，经过尧、舜、禹，到夏、商，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些都有一定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文字到了夏代已经出现，到了商代已形成系统的文字，或者说形成了文字制度，是完全可以确信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并且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有一个“结绳而治”的时期。《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胠箧篇》也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结绳实际上起到符号和文字的作用。郑玄《周易注》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得更清楚：“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故有人称之为“结绳文字”。

到战国末年，开始出现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诸书记载皆同，唯《荀子》所说颇为宛转。“好书者众矣”，说明许多人在劳动、生活中慢慢地学会用字划、图形表事、表意，非出一人之手，而仓颉是一个善于总结、归纳，并加以推广传播的人。《淮南子》、《搜神记》上说，仓颉造

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关于仓颉其人，西汉时人说他是黄帝轩辕氏的史官，东汉以后人说他是伏羲氏之前的帝王，愈演愈奇，“其年代莫能有定。”^①

但是，著名文字学家唐兰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考证之后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文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②后来，他又提出我国意符文字的起源，应在太昊与炎帝时代，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

2. 夏之文字

唐兰先生肯定：“夏时代，文字一定已很发展。”^③近现代的地
下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早于夏代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西安半坡出土的陶片上有刻划的符号，如 丌、丌、丰 等。1959 年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出土的陶缸上，有 亾、亾、乚 等图形。同年，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发现 24 种刻划符号，如 丌、匚、乚、丂、丂 等。虽然许多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符号都是孤立存在，无法识读的，只能谓之文字符号。但也有人认为已是“图画文字”。“乚”是“戊”（钺）的象形字，“匚”是由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丂”即是“山”字，“丂”即是“旦”字。自称“比较保守”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认为，虽然其“用意不清楚”，却也“似乎已有了文字制度。”^④

1986 年在西安郊区斗门乡花园村出土了龙山时期的甲骨文字，据称比殷墟甲骨文早 1200 年，^⑤正好是夏代的文字，把我国文

①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

②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④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⑤ 见《光明日报》1986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

字的历史提前到 4500—5000 年前，与唐兰所说相吻合。

3. 殷代文字制度

单个文字符号的存在并不能明晰地记录语言，表达思想。只有有了联结文字符号的语法结构，才能当作交际的工具。从单个文字的出现到形成文字系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夏代是否已经形成文字系统，还很难肯定，但到了殷商时期，确已形成了有规律的系统的文字制度。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完全可以证明。

其一，文字数量较多。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经许多学者长期研究，已知甲骨文中有不相重复的单字 4500 个左右。可以肯定这还不是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有人估计，“殷代当时通行之文字，至少当有万数乃至两万以上。”^①

其二，文字构造已有规律。我国汉字结构研究起于秦汉，刘歆在《七略》中归纳为“六书”，班固采之入《汉书·艺文志》，即“六艺略”小学类小序中所说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继承了这一理论，修订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确定了汉字构造的条例。^②甲骨文字的构造已具备了这六大类别。早期的甲骨文象形文字多，晚期（特别到了帝乙、帝辛时代）的甲骨文象声字增多。象声字的出现，使文字数量大大增加，并得以更广泛地应用。正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指出的：“为了创造文字制度，象声方法的采用是一个突破点，否则所写的仍是符号和图画，不是文字。”

其三，偏旁部首逐步定形化。甲骨文字的构字法虽然不完全一致，一个象形字会有几个写法，同一形声字可能会用不同偏旁，但构字的偏旁部首确已有了一定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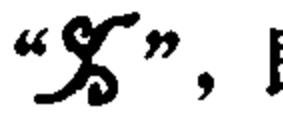
①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 3 册 齐鲁大学 1944 年

② 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 中华书局 1963 年

其四，汉字形体已初步定形。作为汉字的基本形体特征“方块字”，甲骨文已初步具备。甲骨文字是由许多长短交错的线条组成的，自然会形成正方或长方形的单字。后来，汉字的形体书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特点一直保留到今天，从这一点上说，今天的汉字仍然沿用了商代的文字制度。

二、上古时期的史官制度

夏、商、周三代之时，文字是由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文化人所掌握、所利用的。他们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记录国事、征战、农耕、狩猎，以及占卜、蓍筮的经过以验吉凶。这部分人既称史，又称巫，史和巫是分不开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渐渐有了分工。

在甲骨文中和金文中都有“”、“”，即“申”字。郭沫若在《释干支》中说：“要之古十二辰第九位之申字，乃象以一线联结二物之形，而古有重义。”^①杨向奎说：“一线联二物，是指天和人，‘申’是一种媒介物，即‘神’。”^②《说文解字》：“申，神也。”《尔雅》：“申，重也。”意思是说，人与天不能直接相通，必须经过“神”的一番功夫办理，才能知道上帝的意识。“神”是一种无形的来往于天人之间传递天人意识的使者。

“巫”是什么？巫、、舞，古字“”、“”，作舞蹈之状。《说文解字》：“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隆神者也。”即是说，巫要代表人们向上帝祈福，必须长于舞蹈以事于神。国家有大事，也必先求诸神灵，请于上帝，或占卜以验证之。所有这些活动的记录，亦即当时之档案，流传即久，就成为历史资料。

卜、巫、史属于当时的僧侣贵族，较世俗贵族有更高的文化传统。“虽然他们在身份等级上，是国王的僚属，但在王权神化的时代，他们充当神与人之间沟通者的角色，利用宗教迷信，通过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②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卜筮的仪式，把国王的一举一动，都放在他们命令之下。因而实际上，商代的僧侶贵族——卜、巫、史等，就是商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最高指挥者，拥有不小的权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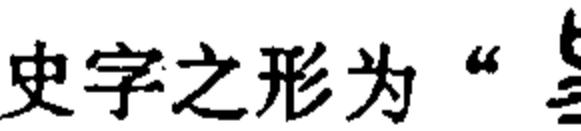
商代官员已经很多，并且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仅甲骨文所记的官名就有 20 多个。其中史官包括尹、多尹、乍（作）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史、北史、卿史、御史）、吏（御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等。^②

到了周代，史官制度更加完善，也有了更加明确的分工。《周礼·春官》“宗伯”条下有详细的记载。其大宗伯所属之史官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朱杰勤认为，西周除五史之外，又有柱下史、女史、州史、阍史、侍史等。^③

巫和史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分工。巫、卜主要负责占卜祈祷，其结果，就是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甲骨卜辞。史负责记录言行、草拟政令、传递和保管政典法令之类的文献。因为不论文献记载还是甲骨文中都有“册”字。简册容易朽烂，故未见流传下来。到了周朝，这种分工就更清楚了。

史官之职著书守典，是有不少文献记载可以证明的。《礼记·曲礼》：“史载笔。”《礼记·祭统》：“史由君右，执简命之”。《左传》：“史为书。”《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礼》：“史掌官书以赞治”。

《尚书·金縢》是一篇很长的为武王消灾祈福的祝辞。因为相当重要，周公宣读之后，史官即记录于简册，并藏之匮中，用金泥封存。故曰：“史乃册祝”，“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

史字之形为“”。《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右”即右手，“中”，一说“官府簿书谓之中，”一说盛简

① 陈茂同《历史职官沿革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 年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③ 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之器谓中，一说中为秘府藏书之正本。解释不同，其意皆谓史是记事掌书之官。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说得更清楚：“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又引申为职事之称。故史、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事三字，左文互通。”

实际上，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掌管图籍典册的具体史官的记载是不少的。《左传》载，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又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子董之，晋于是乎又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它如史籍中所述终古、向挚、屠黍、王子朝的故事，也都说明史官是文献的管理者。

史和巫的分工，使史官有更多的精力从事于文献的编撰和管理，也为图书事业和目录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夏商周之文献

上古史的研究，因为史料缺乏，多凭借传说。传说终归是传说，并非信史。但有些传说，有可能即是历史事实。我国夏朝历来称为传说时代，但是它越来越被更多的地下发掘所证实。

夏代已经有了初期的文字，是否也有文献，现在还很难证实。但是有关夏文献的传说是不少的，《左传》、《国语》常常引用《夏书》。《夏书》今天看不到，到底有没有过这部书？有人用商的例子佐证。《史记》中有夏本纪、有殷本纪，所记殷本纪已由出土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那么所记夏的世纪是否也是可靠的？如果说夏本纪也基本可靠的话，司马迁是否见过《夏书》，或者说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的编者见过《夏书》？

《尚书》中有《虞书》、有《夏书》。开头就说“曰若稽古，”说明是根据传闻整理的。但是这几篇文章所记载的个别史事已被科学家证明是历史的事实。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说，《尧典》所记四方之民，与甲骨文相合；文中的“出日”，“入日”，

“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可见《尧典》的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对《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出那是公元前 2577 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点，证明《尧典》中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纪录。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夏代确有一定数量的文献。

自《左传》言楚之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为何物，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伪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伪《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献，对于这所谓的几部书的解释也许纯属虚构。但早于梅赜的西晋杜预却也说“皆古书名”，不知是否有根据。尽管许多学者以为这所谓的几部书纯属子虚，但仍有一些人坚信它们的存在。章太炎在《检论·尚书故言》中指出：“《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典备王迹而索有谟训诸文，是以二。兹皆载之竹帛，与坟、丘刻石殊条。《三坟》、《九丘》不递次者十二家，有禹、汤、成王，在五帝后也”。章氏把四种书分为三类，《典》备王迹；《索》为谟、训；《三坟》、《九丘》为刻石十二。但他认为春秋之世尚有其书，“外史掌之，左史读之。”^①古文字学家唐兰也承认这些文献的存在，并说可能在夏代以前就有了。他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从卜辞的研究，我们知道了王亥的故事，也知道了四方的名称，就是《尚书·尧典》里的记载，也不是虚构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想春秋时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也一定有些依据。”目录学家姚名达的看法与众不同，认为这些都是类名而不是书名。他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即

① 《章太炎全集》卷三

春秋时代楚国“藏书之分类名称”。还有人说它们是丛书名、目录名，莫衷一是。究竟如何，有待地下发掘来验证。

如果说夏代文献的存在尚缺少证据，商代已有大量的文献，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是说殷代先人已有大量文献，里面有关于殷革夏命的记载。《尚书》中的《商书》不一定都是商代原始文献，有后人的羼入，但其中《盘庚》三篇是完全可靠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也说：“甲骨文和《尚书·盘庚篇》等就是这种‘典’、‘册’，可惜不曾全部遗留下来。但可知这种典册在西周初还大都存在。因而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殷后裔颂赞其先世的《诗·商颂》和《齐侯镈钟铭》等的记载，是至少有部分信史的价值。”《墨子·贵义》上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可见殷商留下的书不少。胡厚宣也认为殷代除文尚简约的甲骨文献外，“必尚有鸿篇巨制之史乘典册。”^①事实上，《商颂》中的有些记述，已被甲骨文所证实。

如果说这些书于简策的竹木文献均已腐烂，难以确考的话，那么当时宫廷里占卜者所记录的另一种文献——甲骨文献，埋在地下数千年，而未烂掉，被我们发掘出来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甲骨文的数量，一说 156 000 多片^②，一说 16 万片以上。^③但这还不是当时甲骨文献的全部。可以肯定还有大批的甲骨文没有出土，而且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被毁坏丢失的也为数不少。

到西周春秋之时，文献渐多，虽存者不其什一，所能考知者亦不少。

《尚书》中的许多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春秋》则是根据

①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三册

②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序》 中华书局 1982 年

③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